



原教評論

真正的當家作主

孫大川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系主任

從 1990年代起，無論在社會氛圍或法政基礎建構上，台灣原住民始終被「捧」在一個暨突顯且有利的位置上，沒有人能否認1990年到2005年是台灣原住民族的黃金年代。尤其民進黨執政後的這五年來，「新伙伴關係」的簽署，「準國與國關係」的提出，不但是一種大膽的觀念突破，而且也連帶牽動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制訂和頒布，為1984年原運啟動以來，最深刻、也最困難的民族自治訴求鋪平了道路，大踏步地滿足了台灣原住民族成為國家之次政治單元的渴望。

這一連串的發展，容或有它複雜的族群政治因素，甚至隱含了大量虛假的空殼承諾；但是，形式要件的架設，原本就需要主體實踐的灌注，人的行動，還是賦予形式以血肉最後的關鍵！原運時代的行動，是在馬上打天下的行動，依靠的是單純的信念和永不退卻的勇氣；而成全「形式」的行動，除了信念、勇氣之外，更需要知識、

方法與能力。球已在原住民的手中，如何投球已經不是靠吶喊或別人的同情所能夠替代。這正是我們原住民當前最大的考驗！

我們不妨把我們的觀察拉回到教育這個層面，並集中焦點在族語推動的議題上。其實早在1980年代原運發軔之初，「還我母語」就已經是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；但除了在天主教、基督教會內有一些具體的推動外，族語的復振尚處在口號階段。1990年代起，教改風起雲湧，「鄉土語言教育」成了一個新的指標。從當時編撰的「鄉土」教材來看，其重點在「鄉土」而不在「語言」，族語不是核心。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，不久原住民族教育法通過。但是，族語並不是當時首任主委華加志的施政重點，原民會所訂定的六年文化振興計畫，僅在原住民族語簡易字典之編撰上，有了初步的規畫，後來卻因為政黨輪替無疾而終。這樣看來，從1980年至2000年整整二十年中間，主觀上縱然大家都承認族語是

民族主體性的最顯著表徵，但是歷經教改運動和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，我們依然始終看不到一個有觀念、有步驟的族語復振藍圖。族語瀕臨斷絕的情況，並沒有得到基本的改善。

尤哈尼主委接任後(2000年)，將族語推上其施政之核心位置，強烈主張族語是通往祖靈之護照。在他大力的推動下，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成立，並設「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」；為達到普及推廣的目的，開始舉辦「族語認證考試」；更與教育部合作委託國立政治大學編撰各族(包括方言)族語教材。從族語復振和民族教育的角度來說，尤哈尼是前三任原民會主委當中任期最短，但表現卻最突出的一位。

明確的政策有了，首長也支持預算的編列，理論上族語的發展應該很快的步上軌道。事實證明：如果沒有專業和積極有效的方法，再好的政策也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。回顧這五年來原民會族語推動的情況，執行步驟的紊亂，是政策落實最大的絆腳石。首先，族語教育的推動，牽涉到「書面化」的問題，邏輯上族語文字或標音系統的確定，應是第一優先的工作；但是，從2000年起至今，卻仍未定案。這不僅讓人無所適從，也嚴重影響族語的教學，更浪費了大筆的經費預算。其次，族語的工作需要建立一個統合的機制，這樣才能使行政的分工產生穩定的內在聯絡。目前的狀況是：教材委由政大負責、族語認證則逐年招標處理、文字或標音

符號之確定則往來於教育部國語會和原民會之間。這對執行的效果，當然大打折扣。另外，族語認證沒有分級，試題的蒐集、製作沒有一套客觀的步驟和準則，四屆族語認證下來，六、七千人通過考試，卻無法具備程度鑑別的功能，這對族語師資人才的培育、運用幫助不大。最後，族語工作的成敗有賴品質良好的教材。目前除了政大獲致了初步的成果外，原民會補助的民間教材，良莠不齊，也缺乏不同年齡階層或不同專業需求所發展出來的教材。其實原住民「族語」未來的希望，不應只在那僅僅佔2%的族人身上，更不應該完全寄託或重壓在原住民孩童身上；如何跨越那2%的門檻，讓更多主流社會的人有興趣學習，才是我們真正的攻略目標。而一套吸引人的語言學習教材，恐怕是達成這個目標最起碼的條件。

民族發展不完全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，主體的挺立也不能停留在情感或意識形態的層次。謙遜地學習並尊重知識，不好高騖遠地一步一步去積累我們的實力，才能走出自己的路，才算是真正的當家作主！

孫大川